

李达学术讨论会综述

段 启 咸

为纪念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杰出的理论家、宣传家、教育家李达同志诞辰九十五周年,1986年5月17—18日在武汉大学举行了李达同志学术思想讨论会。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李达同志的生前好友、学生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百余人参加了会议,武汉大学三百余师生听了大会发言。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李达同志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和历史地位。会议收到论文、资料四十余篇,著作三部。这些论著和与会者的发言高度评价了李达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货币学、法学理论和史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赞扬了他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和理论上的坚定性与开拓精神。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李达同志在哲学上的贡献

与会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各个阶段,李达同志都发表了有巨大影响的著作。早在1919年他就翻译了《唯物历史观解说》等名著。从1920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发起组的主要成员和《共产党》月刊的主编、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的时候起,到1923年他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发表了大量的阐述唯物史观的论文,就其准确性和系统性来说,是首屈一指的。1926年他发表了《现代社会学》,这是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从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内容的深刻性和影响的巨大来讲,都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代表作。大革命失败后,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兴起了一个广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李达同志在这个阶段的哲学活动和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他1935年发表的名著《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这部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各部分作为“一块整钢”进行了系统论述。它既有哲学一般原理的理论阐明,又有哲学原理具体运用的方法说明,很好地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的统一,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一致,还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这是不但优于国内以前的同类著作,也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当时苏联的同类著作,不愧为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同志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为正确地宣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认为“两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这个观点和我们今天对“两论”的说法非

常一致。他抓住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基本特点，对“两论”作了深刻准确而又通俗的解释，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他晚年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也是进一步系统论述唯物辩证法的优秀哲学教科书。

有些学者认为，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富有自己的特色。他的《社会学大纲》系统地论述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指出社会实践是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两者间所必要的联结的规定者；认识的能动性和受动性不可分离地结合着，能动性居优位，而认识的能动性又来源于实践的能动性；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其中包括着由物质到感觉到思维的认识发展过程；强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互相渗透；分别具体论述了感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诸认识形式和实践的关系；提出认识过程的总公式，即“实践→直接的具体→抽象的思维→媒介的具体→实践”，说明这是认识之圆运动的发展，即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辩证的发展。他认为历史唯物论也是“社会的系统观”，指出：社会是包摄生产诸关系的总体、国家形态、法律制度以及一定意识形态的系统，而生产关系是这个系统的基础。劳动是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的物质代谢过程，对社会具有规定意义，劳动概念的把握，是成就历史唯物论的基础。由此，他既反对单纯从外部自然去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也不赞成对社会作孤立考察，而是主张立足社会，从社会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中去揭示社会历史的奥秘。对社会这种复杂而又不断发展的系统，他既从横的方面深入剖析其结构，又努力作纵的即历史的分析。因此，他对历史唯物论的论述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他在说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指出：一定生产关系内的生产力尚有发展余地时，人们欲以主观要求去改变它，生产力就要衰减，社会就要退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深刻的发挥，在李达同志的著作中可以找出很多，值得认真研究。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李达同志始终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他的论著是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为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而写的。早在党的“二大”发表宣言后，他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由介绍时期进到实行时期了，强调对这样重大的事实要认真研究，并提出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研究致用学术的问题。从那时起，他始终坚持这一宗旨，在各种著作中都公开申明自己写作的目的是探寻革命实践的指导原理。他的《社会学大纲》反复论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实践居优位的原则，指出：“要懂得实践优于理论的见解，就必须理解实践是认识的出发点和源泉，是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他用大气力去说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是认识和实践改造世界的理论与方法，并把自己的这本书“献给英雄的抗日战士”，以帮助战士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和行动的方法。他说明哲学是概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而形成的世界观，必须以这些科学作中介去指导实践，而不能把它作抽象公式强加于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不是用中国的实际作一般原理的例证，而是用一般原理作指导，探讨中国社会固有的特殊规律。在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上，李达同志反对简单化的倾向。

有些同志还谈到李达的哲学研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作用问题。李达把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原则贯彻到历史唯物论中，说明历史唯物论是具体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反映论，指出社会意识是反映经济构造及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的东西，同时它对两者又有很大的反作用，而这种反映是能动的。一切反映社会变动事实的革命学说，是革命阶级实践的契机，能够促进社会的改造。后来，毛泽东同志赞同、吸收了这些观点，并进一步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有的同志还举了不少例证，说明《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同志的“两论”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李达同志在经济学、法理学和史学理论上的贡献

与会者认为李达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且是一位作出重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早年在很多文章中阐述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后来又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教学，翻译和撰写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他1929年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学习列宁写《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的方法，利用国内外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统计材料，对中国近代经济的演变和特征作了深入分析，深刻说明当时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这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经济的第一本著作，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很快被翻译成俄、日等国文字。他1935年印行的《经济学大纲》一书，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重要著作之一。与我国略为早些时候出版的几本同类著作相比，理论要严谨些，涉及的问题也广泛些。该书说明经济学要联系生产力的特定发展阶段来研究生产关系的总体，还要研究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这一深刻见解至今还有启发性。他阐明了恩格斯关于广义经济的思想的重要实践意义，指出广义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先资本主义诸社会经济形态，而且要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尖锐批评了当时经济学界只研究外国经济而把中国经济忽略了的作法“是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他在该书的第一部分，联系中国经济的历史实际，分析了先资本主义诸社会经济形态，很有特色，而第二部分则完整、系统、谨严地依据《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体系，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作了系统、深刻的分析，有许多独到见解。该书虽然未能按原定计划，系统写出社会主义经济部分，但他在其他许多论著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产生、特点、所有制、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作了论述。特别是早年提出完成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要“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的观点，晚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在国家计划领导下，实行商品交换的观点，与我们经历了痛苦的教训后得到的认识，也很一致。他在三十年代中期写的《货币学概论》，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著作。它不仅标志着中国货币理论领域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同时，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角度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向部门经济专业渗透的开端。就其理论的严谨和深度来说，即使放在三十年代世界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水平上来衡量，这部著作也是高水平的。在这么广阔的经济学领域作出如此巨大贡献，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有些学者认为，李达还是我国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他1947年写的《法理学大纲》，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法学理论的专著，具有开拓性，对我国新法学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该书除论述了法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还对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各个法学流派的学说，作了深刻批判，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在这方面还很少有人超过他的水平。五十年代他又写了一系列阐述社会主义新宪法的论著，为我国的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有的学者还认为，李达同志是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他是继李大钊之后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代表，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了世界史和中国史的许多课题，取得了重大成果，写了不少论著，为创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卓越贡献。侯外庐、吕振羽等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曾著文深情地回忆李达同志当年对他们的巨大影响。

三、李达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性

与会者高度赞扬了李达同志的理论坚定性。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理论活动中，坚定地实践了自己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忠于主义”的箴言。解放前，他在白色恐怖下，不顾反动政府、宪兵、特务的通缉、监视、跟踪、威胁、查抄、毒打，不顾解聘失业带来的饥寒之苦，从没有动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强信念和为主义献身的决心。建国以后，在“左”倾思潮席卷而来时，他从不随波逐流，从不违心地和无原则地附和错误见解和错误倾向。1958年刮“共产风”时，他坚决反对，著文论述区分共产主义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的重要性。当陈伯达等人煽起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错误思潮时，李达同志坚决抵制。对于经济领域中那套危害性很大的“左”的做法，他很反感，明确指出：“如果不顾客观规律，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共产主义就会搞成破产主义，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变成人民空社。”在康生等人发动对杨献珍同志的“批判”时，他明确表示反对，叮嘱自己的助手，在他主编的书中“不要提‘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词句”。当林彪鼓吹“顶峰论”时，他立即挺身而出，公开宣布：“我不同意！不符合辩证法，谁说也不行。”他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顽强抵制“左”倾错误，最后竟以身殉。李达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是崇敬的，但在理论是非上他不盲从。当他和毛泽东同志的看法不一致而又认为自己正确时，敢于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正如杨献珍同志的文章说：“象李达同志这样有坚强党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该是我国哲学界的泰山北斗。”

与会同志认为今天我们要特别学习李达同志的这种理论坚定性，理论联系实际和开拓、创新精神，以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上接第60页）

垒的实力，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发达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使用非关税壁垒的能力，如在运用质量标准时，他们的检测手段就远不如工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种种事实说明，新贸易保护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比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大得多。例如，1977年，在工业发达国家出口贸易中“受到管理的贸易”部分占27%，而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中的这一比例却高达62%；又如，1980—1983年工业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额下降了8%，而同一期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额却下降了18.9%，1984年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额已相当于1980年水平的98%，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才只相当于84.6%。

注释：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1985年第7期。